

郭沫若研究

学术座谈会专辑

文化藝術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

学术座谈会专辑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文 化 延 衍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辛一

封面装帧：曹辛之

郭沫若研究

学术座谈会专辑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秦皇岛市印刷二厂排版

北京通县湖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9³/₄ 字数219,000 插页4

1984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950册

书号10228·085 定价1.45元

目 录

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 扬(1)
学习郭沫若，研究郭沫若	石西民(7)
正确评价郭沫若同志	李一氓(19)
实事求是地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郭沫若	夏 衍(25)
郭沫若与哲学	刘大年(32)
党喇叭外二题	林 林(40)
组织起来，开创郭沫若研究新局面	马识途(46)
热切的希望	王惠德(53)
几点建议	梅 益(54)
祝贺和希望	赵 寻(55)
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左联”	孔罗荪(57)
由编注《郭沫若全集》想到郭沫若研究工作	马良春(59)
诚挚的敬意 微薄的献礼	华忱之(65)
郭沫若研究在上海	陈永志(74)

郭沫若研究在曲阜 谷辅林(79)

五年来关于郭沫若史学的评论与研究

..... 叶桂生 刘茂林(82)

日本译介郭沫若著作之一瞥 吕元明(97)

关于郭沫若史剧创作之管窥 石凌鹤(113)

郭沫若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林焕平(119)

纪念郭老的几点感想 孙席珍(123)

“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关系的事情” 黄淳浩(127)

——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辨析

试论郭沫若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傅正乾(142)

谈郭沫若在抗战期间未完成的几部历史剧 高国平(162)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诗情 邱文治(172)

略论郭沫若戏剧的民族传统特色 黄侯兴(194)

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 黄烈(208)

“遵命史学”的典范 方诗铭(229)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创者 田昌五(233)

科学的方法，完整的体系 王世民(238)

—— 略谈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成果

关于郭老的“兰亭论辩”问题 李长路(244)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 叶桂生 刘茂林(253)

浅谈思想家郭沫若的研究 萧薰父(281)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章程	(292)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295)
广泛、深入地开拓郭沫若研究的领域(296)	
——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	
简讯二则	(303)
编后记	(305)

在郭沫若研究 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 扬

刚才石西民同志讲了话，谈到研究会将要进行的工作。我是很年轻时候受到郭沫若的影响，对他可以说是很有感情的。郭沫若研究学会到底怎么办？还有几天时间大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研究同时代的伟大作家有它的方便和困难，研究郭沫若也不例外，因为同时代的人牵扯到各种关系，因而就有各种看法，难免夹杂感情的色彩。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把它当作科学的课题加以研究。郭沫若是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杰出人物。讲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有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有不到一百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两类传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种传统，一个是五千年，一个是不到一百年，后者比前者离今天更近，对今天的影响更直接，因此更应该大力研究。特别是象郭老这样一位作家，又是文学家、又是剧作家、又是历史学家、又是古文字学家，涉猎的方面很多，所以更值得我们很好地分门别类地研究。

文化事业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认为这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的奋斗目标。学会建设这种文明，学会领导和组织这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

一个过程。文明、文化是不能靠强迫命令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经过群众性的讨论研究。因此我赞成成立郭沫若研究学会。当然，现在有些学会也有缺点，好象太滥。滥了不好，但学会还是需要的；并非滥竽充数的学会不但需要，而且十分需要。这种形式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提高。学会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意见，会有争论，这个没有坏处。没有争论、争鸣，学术怎么能繁荣发展起来呢？既然是学会，就是科学性的组织，所以研究郭沫若第一位的是讲求科学性，要有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要承认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既不要有溢美之词，更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郭沫若的学术成就范围很大，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算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仅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而且在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等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贡献。他是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他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科学两大门类中都兼有所长。所以在开国以后，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文教委员会负责人，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对郭沫若研究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分门别类搞。

研究当代作家，特别是当代伟大作家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古代作家还麻烦。当代作家有的还活着，或者同他有关系的人还活着，正是因为是朋友、熟人，研究时难免夹杂一些感情。当然，科学研究也不能没有感情，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有感情，革命的感情嘛。但不能感情用事。没有革命的感情怎么能研究郭沫若，研究鲁迅、茅盾呢？这同科学性不矛盾，恰恰是一种需要，一个条件。对郭沫若的研究应该有热烈的感情。

“五四”以来有人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分为两大流派，我看是可以这样看的。问题是具体研究一下这些流派的产生、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很多人，包括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都受了郭沫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郭沫若的这种革命精神培育起来的。研究郭沫若可以按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流派进行研究，这两种流派都有它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因素。现在大家都承认现实主义是最好的方法，但它也有自然主义的流弊。我们对茅盾是很称赞的，他对这个自然主义也有所自我批评。

郭沫若是文学家，是以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我跟郭沫若同志谈过，科学好象不能有浪漫主义，但科学应该有幻想，有革命的感情。研究郭沫若的一生，不能离开他整个思想感情以及毕生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果离开这些就不能正确认识郭沫若。郭沫若是感情非常丰富的，那时候我们受郭沫若的影响，也是在这个丰富的感情上受的影响。当然也可以产生不够冷静、不够科学的毛病。但郭沫若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在这方面有缺点，也是一个伟大战士的缺点。

我们对郭沫若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伟大的文化巨人，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郭沫若的功劳就是用他的著作、行动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搞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简单的事情。象我们这些人，象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老一点的，受过各种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封建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信仰，对郭沫若来说也是新的信仰。但郭沫若比我们强，因为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容易的。许多人都以历史唯物

主义者自诩，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对历史上的事情都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是很难的。首先一个问题是你掌握历史材料没有？如果你没有掌握材料，没有这个“物”，怎么能算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所以我今天讲，是表示一种愿望，要做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首先要掌握大量历史材料。郭沫若就有这个条件，鲁迅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掌握了中国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是不是我们把做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努力目标提出来？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应当努力去做，要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嘛。历史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我们都不要搞。过去写的东西，机械唯物论不少嘛！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既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又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不是很容易。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容易的事。信仰上可以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你可以付出生命。但是思想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还很难说。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很彻底的，但在他的晚年，唯物主义也没有贯彻到底，某些方面还走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讲到了。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都相信毛泽东同志，甚至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这是后来才觉悟到的，知道了自己不高明嘛。可见做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难的事情，要终身努力、终身行事。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去的时候，有个三十年代的老同志问我：你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什么收获？我想了很久，要讲心得只有一个：经过整风认识了自己还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还是讲这个话，隔了三十多年了，我还是说：做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容易。拿这一点来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

那天一珉同志提到两篇文章，回去以后我一看确实写得不

错，就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评价当时的功过，充分肯定了“左翼”的功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有一种倾向，好象“左翼”搞错了。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否则怎么能正确评价呢？现在舆论界，特别是国外有一种倾向：专门把受过“左翼”批评的人抬得很高。恰当地批评，纠正我们“左”的错误是完全需要而且应该的；但贬低“左翼”专门抬高“左翼”以外的东西就不合适了。最近听说梁实秋很怀念北京，想回来。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我们欢迎他回来。当时鲁迅和梁实秋论争到底谁是谁非，是非界线不能模糊。他不是敌人，过去把他当成敌人。在某种意义上讲，在思想上把他当作敌人，那是对的；现在不是敌人是朋友，他要回来，我们欢迎他；但过去批评他并没有错，鲁迅也好，创造社也好，对他的批评都是对的。所谓不对，就是方法上可能有缺点：可能有点“左”的情绪，还有一点就是不大讲策略。我们的缺点，主要是这两条。

鲁迅的文章也不是毫无缺点的，他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他讲策略，比我们讲策略，这点鲁迅比我们高明多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需要掌握党的策略思想。

评论前人的功过，不要因为革命运动犯过不少错误，犯过今天听起来象是很可笑的错误，就对历史做出不正确的估价。譬如从事文学革命、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为这种运动不惜牺牲生命，不只是不惜生命，而是牺牲了，而且牺牲了很多人啊！对这样的历史，我们不做出正确估价，听任一些人妄加评论，把“左翼”说成还不如梁实秋啊，还不如胡适啊！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也就相信了这些。这样地对待历史，就完全不是唯物主义，完全不公道了。

一提到的那篇文章是讲郭沫若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几十年过去了，还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潮呢？五十年前是有这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创始人跟各种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了斗争，进行得很漂亮。马克思去世以后，我们也进行了这种斗争，不过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成功了。现在仍然有资产阶级思潮，我们要进行斗争。怎样学会更好地斗争？就是知己知彼，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首先要了解他们。

鲁迅谈到《中国青年》上有一篇文章，对朋友讲得很多，对敌人讲得很少，鲁迅认为应该更多的了解敌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重新分清敌我、是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现在和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不同了，情况复杂了。最近思想界一度流行“萨特主义”。有人说鲁迅也是存在主义，我们听起来觉得是很荒唐的。什么主义也好，凡是流行的东西，都有一种吸引力，一些较年轻的同志，觉得这是“新生事物”，所以鲁迅也变成存在主义了。

所以我们对任何新出现的事物都要加以注意和研究，不要想当然地乱捧或者乱骂一通，这不是正确对待问题的态度。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马克思主义者要继承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包括当代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但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自己鲜明的思想旗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剥削阶级的思想混同起来，更不能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思想旗帜。

这次会开得很好，大家讲了很多好意见。我相信，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学会一定能搞起来。有这样一个好的开端，一定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学习郭沫若，研究郭沫若

石 西 民

各位同志：

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发起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正式开始举行。我代表座谈会筹备组向今天与会的郭老生前的老战友，各科学文艺单位的负责同志，各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教授、学者、郭沫若研究工作者，以及新闻出版单位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郭沫若同志离开我们快五年了。在郭老逝世五周年前夕举行这个座谈会，也可以说是我们对这位文化伟人的一次有意义的纪念活动。

郭沫若同志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面，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家和文化伟人。五年前，邓小平同志在《悼词》中代表党中央对郭老作了高度的、全面的、科学的评价，称赞郭老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

一面光辉的旗帜”。周恩来同志早在一九四一年《我要说的话》一文中也赞扬郭老的“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并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作为一个革命家，郭老具有崇高的品德。综观郭老一生，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期，而且在革命低潮时期或严重困难关头，始终表现了坚定、勇敢和牺牲精神。一九二六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了，在这严重的时刻，郭老经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他不顾蒋介石的通缉，奋然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瑞金由周恩来、李一氓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起义失败，他经历千辛万苦辗转回到上海，仍然运用他的如椽之笔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高唱战歌。一九二八年以后流亡日本的十年间，他始终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在贫困的生活中，在日本宪警的严密监视下，他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还翻译了不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参与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文化活动，积极支持“左联”东京分盟的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不顾生命安危，摆脱日本宪警的监视和追踪，抛妇别雏，归国请缨，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波；在国民党统治区，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团结广大文化界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并以自己的笔和舌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对内独裁、对外投降的罪恶行径。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两个中国的命运进行决战的关头，他又冒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英勇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同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和法西斯统治进行了针锋相

对的斗争。在香港期间，他积极宣传党的建国方针和土地纲领，在国内文化界和海外侨胞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应该指出，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郭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贯彻党对国民党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始终没有涂脂抹粉的歌颂，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永远是一个人民的战士，是挺立在寒风冰雪中苍劲的青松。晚年，他遭受“四人帮”的迫害，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至死抱着崇高的敬仰和坚定的信念，怀有最诚挚、最深厚的阶级感情。当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的时候，他和全国人民一起，由衷地欢呼党和人民的胜利，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作为一个革命家，郭老一生不仅充分表现出他的“威武不能屈”，而且表现了他的“富贵不能淫”的高尚的革命气节和情操。北伐战争时，蒋介石看中了郭老超众的才华，用密任郭老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手段，企图拉拢收买郭老为他效命。但是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了。当郭老觉察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时，奋笔疾书震惊中外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又多次软硬兼施，企图对郭老进行利诱、拉拢，然而蒋介石的希望再次落空了，郭老是决不会为蒋介石及其党羽捧场的。晚年，当江青一伙策划所谓“批林批孔”、阴谋陷害周恩来同志、对郭老又打又拉时，郭老洞察其奸，坚决和周总理站在一起。

作为一个革命家，郭老一生还处处显示对党的无限忠诚。他一贯遵守纪律，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甘愿做“党的喇叭”，忠诚地宣传党的主张，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抗战初期，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放弃了个人的意见，听党的话，出任政治部

三厅厅长的职务。他说过：“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他这种“党喇叭”精神一贯始终，至死不变。

作为一个革命家，郭老一生忠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团结大多数，进行巧妙而又有成效的斗争。郭老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所处的环境是十分险恶的，但郭老善于团结文化界各种进步力量和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人共同战斗。回忆一九四五年初在重庆由郭老亲自发起《文化界时局进言》的签名时，文化界团结战斗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份由郭老亲自草拟的“进言”，巧妙地支持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是对国民党反动独裁政权的一大挑战，几天之内就有三百多人在宣言上签字。宣言在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轰动了整个大后方。郭老不仅草拟宣言，还亲自出马征集签名。郭老作为一面旗帜的作用，凡在国统区参加过斗争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郭老来去从容，泰然自若，在各种集会上，发出了锋利的抨击，妙语横生，豪言惊人。他的文章和演说，团结和鼓舞了广大文化界人士为战取光明而斗争。

总之，郭老确实做到了“把生命奉献给中国人民”。历史自有公论，决不是哪一个人可以任意歪曲的。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郭老是人而不是神。在我们都亲历过的十年动乱时期，郭老当时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因此难免有某些缺点和错误，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

至于青年一代，他们当中许多人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对郭老的革命业绩，缺乏了解，或了解不多，这确是我们研究工作者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因此，向广大青年宣传介绍郭老

一生的战斗业绩、郭老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二

郭沫若同志是举世闻名的学者和文豪。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象他这样博大精深、才华横溢，无论在文学、艺术、历史学、古文字学、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的人，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在文学、史学等许多领域，都处于开拓者的地位。他的开一代诗风的《女神》，从内容到形式都给我国“五四”以来的新诗以最深刻的影响，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作品。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有影响的倡导者。他的《屈原》等历史剧独树一帜，不仅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作用，而且也为我国新型历史话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他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划时代的著作。他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第一次根据探讨殷周社会历史的需要，对甲骨文进行分类整理和考释，对两周金文进行断代和国别研究，把零乱的考古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他的古史分期主张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并且带动与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思想史方面，特别是对先秦诸子，郭沫若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有